

## 漢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述評

陳振寰  
國際關係學院

1991年11月21日至23日，漢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華中理工大學舉行。參加會議的國內外漢語言學家共59人，其中大陸學者44人，臺灣學者8人，南韓學者3人，日本學者2人，德國學者1人，荷蘭學者1人。這是在中國舉行的第一次以漢語語音學研究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大會共收到論文68篇，會上宣讀討論51篇，另17篇因作者未能與會，只作為交流論文派發。

研討會給我們留下幾點印象：

(一)論題廣泛，內容豐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漢語語音研究」，提交研討會的論文幾乎涉及了歷史語音和現代語音研究的各個領域，包括古代漢語語音(音韻學)研究，漢語方言和普通話語音研究，語音與文化，語音與文字、詞匯、語法的關係的研究，漢藏語音比較研究，漢語與印歐語語音比較研究，語音史及音韻學史研究，音韻材料的微機處理研究等等。

(二)觀察敏銳，分析精密。很多講評人都使用了這樣的評語來評論會議論文，這絕非溢美之辭。總體說來，這次發表的論文無論是就理論探討的深度、材料開掘的廣度而言，或是就方法運用的靈活程度而言，都較過去同類的研討會前進了一步。

(三)討論熱烈，實事求是。討論分兩個會場、八段時間進行，每篇論文都有40分鐘的討論，時間相當充裕。同時，由於每篇論文事先都安排了評講人，而評講人絕大多數都曾研究過與所評講論文內容有關的問題，因而多能提出中肯的意見。

(四)青年學者脫穎而出。這次研討會的與會者包括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會長、學術委員會主席以及臺灣聲韻學會會長在內的許多國內外知名學者。在與會的國內外學者中，45歲以下的青年學者約佔65%，這在過去同類的會議中是很少有的。他們的論文，材料豐富，方法出新，思路寬闊。在討論中，他們發言踴躍，提出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見解，使與會中老年漢語語言學家感到後繼有人，極其欣慰。

下面，我準備選擇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論文向大家介紹。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前中國音韻研究會會長邵榮芬先生的論文是《陸德明反切用字析略》。陸德明《經典釋文》所用反切有兩萬多個，超過《切韻》反切十倍以上。邵先生用統計對比的方法，得出陸氏反切用字的基本特點，「發現陸氏反切

上下字的選擇至少在七個方面出現明顯的傾向性」，這「不僅對了解陸氏音系本身是必要的，而且對旁證《切韻》及古反切的共同特徵也有助益」。例如：統計比較證明陸氏切語與《切韻》切語有很大的一致性，這對於證明《切韻》音系「大體上是一個活方言音系」的性質是很有裨益的；統計證明切上字規避複合元音，規避二四等韻，規避去聲字；切下字則規避送氣清塞音、塞擦音聲母字，這不但對研究中古音系的某些特徵和具體構擬中古聲母、韻母、聲調有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古反切的構成原則也很有意義。當然，邵文也有不足之處，主要是過分限制篇幅，只能提出結論，沒有原始材料，甚至沒有典型例證，沒有演繹推理的過程，缺少必要的論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章的可信性與可讀性。我們期望着邵先生《經典釋文音系》全稿早日問世。

對大量材料進行整理、分析、比較，在這基礎上得出有意義的結論，是這次研討會多數論文共同特點。除了邵先生的論文，我還想提到上海兩位青年音韻學家虞萬里、楊蓉蓉的《避諱與古音研究》。對避諱與古音研究的關係過去有人注意到，但還沒有人花力氣窮盡收集避諱材料並以之探討音韻問題。虞、楊二位「遍檢經、史、子、集，搜得避諱資料萬餘條」，梳理出避諱與語音相關的四個方面：因諱而改字音，以同音字代諱字，嫌名諱，韻書中因諱改韻目、刪小韻、改韻字、改釋義、改反切等等；並且透過避諱所表現的聲韻關係，探討了某些歷史音變現象和古方音問題。儘管文章體例還嫌駁雜，沒有做到詳盡地排比資料解決若干重要的音韻問題，但仍然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在語言研究中，擇取典型的「點」，作突破式的研究，常能得到規律性的認識。這次研討會上有好幾篇論文就是致力於「點」的突破。我想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吳登彬先生的《漢藏語和南島語的「米」同源試證》為代表。這篇文章就「米」這個詞在古漢語、古藏語和南島語系諸語言中的語音面貌進行擬測和比較，確立了古南島語的 *bərad* 和古漢藏語的 \*\*\* *mrad* 有語音上的關聯，進而推論出古南島語的「米」\* *bərad* 借自古漢藏語，證據充實，推理細密。作者還通過「米」的借貸關係進一步推測古南島人應居於中國古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後來由於某種原因，駕船遠渡重洋來到西太平洋諸島上。這樣，文章的意義就超出了一般語言學的範圍，對民族史學、古地理學，甚至植物栽培史研究（證明稻米始種於中國大陸）都有一定的價值。

形聲字是研究漢語古音的重要材料。過去，音韻學家在研究諧聲時，多是把主諧字與被諧字作詞的整體讀音比較，山東聊城師院賀德揚稱之為「詞音諧聲原則」。賀德揚的論文《漢字的詞根音諧聲》大膽地提出了「詞根音諧聲」的原則，他根據古文反映的一些遠諧聲現象和主諧字與被諧字形、音、義關係，認為上古漢語存在着詞根，以詞根為基礎附加前置輔音是上古漢語的一種構詞方法，某些本義和引申義的關係其實是根詞與滋生詞的關係。他認為像使從吏聲、數從婁聲、麥從來聲、鼻從自聲這種遠諧字，實際是詞根音的諧聲。他還運用這個原則重新考釋了甲文束、帝、丙、商四

字。王力先生曾經批評清儒雙聲通轉說，認為兩字諧聲通假必須具有聲韻同時相同或相近的條件。這個原則對解釋上古使、吏、數、婁之間的關係確有疑惑之處，以賀文詞根諧聲的假設來解釋，便能自圓其說。當然，詞根諧聲畢竟還是個假說，需要有更多的材料加以證明，而且這個假說是以上古漢語有複輔音為前提的，前提若不成立，則假說必難成立。但我仍然很支持這樣的探索。

利用梵漢對音構擬古漢語聲韻系統是前人很有成績的領域，這次會議的某些論文在前人成績的基礎上又有所前進。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劉廣和的《東晉譯經對音的晉語聲母系統》就很有創獲。劉廣和利用東晉高僧法顯等人譯經中的大量梵漢對音材料，並作了審慎的校勘，去誤存疑，然後構建了東晉語音的聲母系統。他將這一聲母系統置於語音史中上下比較，得出東晉音應劃歸中古音系的結論，並以之證明了上古部分匣紐字來自舌根塞音(俞敏說)、先秦喻四為舌面中邊音(王力說)、古無輕唇、古無舌上、喻三入匣、章組來自舌頭音等。當然，對音材料難免有主客語疑似的誤差、早傳佛經本身梵俗音的混染、譯者方音的殘遺、傳統讀書音的干擾等，單憑譯音材料構建一個時期的聲韻全貌是有一定危險的。好在作者也注意到這些問題，並作了一些分辨工作。

這次會議引起我們興趣的還有許多文章，例如臺灣陳新雄先生的《今本廣韻切語下字系聯》，根據自己對陳澧系聯法的補充條例，參照《切韻》殘卷切語提供的材料，對今本《廣韻》反切下字作了重新系聯；潘悟雲《上古漢語和古藏語元音系統的歷史比較》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上古漢語和古藏語的元音雖有些不嚴格對應的例子，但大體上在傳統的旁轉範圍內變動，而且跟藏語三時一式的元音變動範圍也大體一致；王碩荃《韻會音系基礎初探》認為《韻會》音系的基礎方言是元代邵武話(作者黃公紹、熊忠的家鄉)，而不是歷來所認為的元代「標準音」；蔣希文《中古知、莊、章三組聲母字在南城、攸縣方言中演變情況》以這三組聲母在方言裏的特殊演變，論證了演變規則要受方言自身結構規則所制約的規律；楊耐思《八思巴字漢語音系擬測》扼要提出擬測八思巴字漢語音的三點依據和擬測中必須注意的四個問題。此外，像唐作藩《江永的方言觀》、尉遲治平《說之》、施向東《中古漢語合口介音的一個來源》、麥耘《利用梵漢對音構擬〈切韻〉遇流二攝元音》、鄧希敏、陳漢清《音韻學專家系統生成機制初探》等等，都能抉疑發微，卓有見識。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介紹了。